

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生成的人学逻辑“注脚”

刘伟兵

摘要: 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实质上是人类文明建构的进程,是现代化的世界历史阶段里人学逻辑对资本逻辑扬弃的过程。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生成于由资本开启的世界历史进程,是对物的依赖阶段中由资本带来的全球性、文明性的现代性弊病的扬弃。而历史生成的进程本身也蕴含着从现实的个人出发,通过实现“我们再造”,趋向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学逻辑。这条人学逻辑是通过世界市场基础向人类社会转变,以及文化交往和利益普遍交往的实践而历史生成的。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人学逻辑;历史生成

中图分类号: D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169(2023)05-0001-07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230313.002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之一,是新时代对中国式现代化拓展的重要表现。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并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关联起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1](P62)},这一主张在当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学界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容、意义、路径、来源与内在逻辑进行了多维的研究,并在争鸣中形成了诸多共识。当前学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形成来源和内在逻辑的把握,大多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类本质、文化来源、政治经济学等路径出发,深入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对世界历史、共同体理论、人类共同价值等理论的践行与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崛起的中国提出的一个新命题,是历史必然性、实践自觉性、理论创造性有机统一的时代产物。”^{[2](P1)}随着这一研究路径的愈加深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体性逻辑愈加彰显。因为历史是属人的历史,文化也是属人的文化。在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形成过程的把握中,不可避免地要触及人的主体性逻辑,即人类是如何在历史实践过程中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因此,在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生成的必然性考察中,把握其中的人学逻辑,成为了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关键。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生成

从唯物史观的视域出发,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在不平衡的发展悖论中走向共生、共赢、平等的全球化的一种方案,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发展,是对唯物史观中社会第二形态为第三形态创造条件的现实回应。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根植于世界发展的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认同问题研究”(21CKS031)

作者简介:刘伟兵,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讲师,wbliu595@163.com(上海 200433)

历史生成，并不意味着目前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彻底形成。因此，只有在世界发展的历史逻辑中，才能客观地理解与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生成的必然性与内在的科学性。

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生成是根植于当前全球化发展的新阶段与新特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历史在 21 世纪发展的新阶段。当前，世界历史的深入发展已经到了全球化的历史阶段。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形成了联系紧密的有机体。全球化关系构成了每一个人发展的重要向度。“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3](P541)} 人的不同向度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解放与发展，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成的历史前提。在经济方面，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更加紧密。世界市场的形成意味着全球化时代的生产成为了世界性生产，全球化时代的产品成为了世界性产品，全球化时代的消费成为了世界性消费。“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4](P35)} 于是，人与人的经济关系也在世界性生产和消费中开启了普遍性的可能。人们可以消费到相同的产品，可以进行全球性的生产，可以进行世界性的普遍交换。在这一过程中，建立在经济合作、经济竞争、全球性消费、全球性交换、全球性流通、全球性生产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生成的经济前提逐渐形成。

在政治方面，世界历史的深入发展已经到了世界政治格局深度调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以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力量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这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对比。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在国与国的“平等”中获得了“平等”的可能。这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生成提供了政治前提。

在文化方面，世界历史的深入发展使得精神产品呈现为一种世界性产品。“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4](P35)} 人们不仅可以享受世界性的文化产品，还能在文明互鉴过程中进行普遍的文化交往。人与人之间的文化交往愈加紧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生成提供了文化前提。

在社会方面，世界历史的深入发展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愈加紧密。世界性的社会组织蓬勃发展，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也呈现为世界性的样态。如今，人们可以更加方便地去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旅游，可以有机会参加世界性的社会组织。人的社会关系在全球化时代得到了极大丰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生成提供了社会前提。

在生态方面，世界历史的深入发展使人与自然关系背后是人与人的关系愈加凸显。全球化的生产与消费方式更是造成了世界性的环境保护问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和个人在全球性问题面前能够独善其身。这种历史特性亟需世界提出新的全球治理方案。人与人的关系在世界历史进入全球化时代后就显现为人与人的关系。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保护局部生态环境也是保护全球的生态环境。这一关系的揭露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生成提供了生态关系前提。

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生成是根植于社会第二形态为第三形态形成创造的历史条件。马克思曾通过对人的关系把握，划分了社会发展的三种形态。“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5](P52)} 第二形态是资本开启的现代化阶段，建构的是现代社会，创造的是现代文明。“资本逻辑决定着现代性逻辑的生成与发展，现代性逻辑的诸种基因就孕育在资本逻辑的内在联系、基本矛盾和演化趋势之中。”^{[6](P29)} 在这一过程中，“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5](P52)}，生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方面，是在物的依赖阶段里，资本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会自觉地提高固定资本的投入，

间接地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这为第三形态的到来提供生产力准备的同时，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成提供技术条件。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所以能够在现在被提出和推进，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世界的联系愈加紧密。而这一历史条件的形成，正是由于第二形态时期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因为“没有流通时间的流通——是价值增殖的最大限度，它的否定等于资本生产率的最高肯定”^{[7](P18)}。对流通时间的压缩，依赖的是技术。这不仅表现为依赖交通工具压缩空间上的流通时间，还依赖于通讯技术压缩交流时间，依赖于数字技术压缩金融流通时间等。正是在此意义上，人与人的联系更加紧密，开始具有了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技术可能。另一方面，在物的依赖阶段里，社会出现物化、异化等现代性问题，为第三形态的到来提供历史必然的同时彰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人们看似从原来对人的依赖的束缚中激发出来，确立了自我，但是又很快地陷入了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窠臼中，陷入了更大的不自由。而资本带来的现代性悖论，更是产生了更多的“文明病”现象。例如，物质财富大量生产的情况下，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方便生产的工具大量生产的同时，却使工人生产任务更加繁重。这些现代性悖论越深刻，第二阶段的社会矛盾就越深重，人们对真正自由全面发展的第三阶段就越期待。其中，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立足于对物的依赖的社会形态中，能动地扬弃和克服当前许多现代性悖论，为第三形态的到来做准备。“从人类社会演进的一般规律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趋向于‘自由人联合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启示于‘自由人联合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待于发展到‘自由人联合体’，这一趋势不可逆转。”^{[8](P122)}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对当前包括经济、文化、政治、安全、生态等出现的现代性问题的一种治理方案，是以共享、共赢等趋向第三社会形态的价值取向来扬弃当代的现代性悖论，是以共治、共建等更先进的方式重构当前的全球治理。

由此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新时代对由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带来的一系列现代性问题的反思，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下发展，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第二形态为第三形态出现准备条件的自觉实践。当我们从世界发展的历史逻辑和唯物史观的理论逻辑出发，把握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生成路径的历史必然性时，会面临着一个新的追问，其内在的人学逻辑又是如何体现呢？为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只有深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生成中，寻找人学逻辑的在场。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生成中的人学逻辑展开

行文至此，我们发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历史生成的新形态、新阶段、新方案，具有自己的历史必然性。作为以人为主体的全球治理新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历史生成中，从缘起、建构到发展还存在一条人学逻辑。因为历史是人的历史，历史生成是属人的历史实践。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逻辑的把握，不可避免地要触及人的主体性以及实践性带来的人学逻辑。正是这条人学逻辑的存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在历史生成的必然性与科学性基础上实现价值性的建构。因此，只有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生成中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学逻辑，才能客观全面地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性。

首先，对现实的个人的把握，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学逻辑的逻辑起点。人是社会的主体。包括生产力、实践等在内的一切社会因素都是属人的。社会规律内并不存在“没有人”的规律。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人明确为历史的主体，其实就是在当下世界历史阶段对人类文明的主体性重构。

由于“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P501)}。这种现实性也是一种必然性，表现为每一个人既是共时状态下社会化的规定，也是历时状态下历史的规定。“可见，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发展的历史）。”^{[3](P194)}在物的依赖阶段，资本关系构成了人的主要

关系，占据了社会关系的主导。这彰显了在资本开启的世界历史阶段，资本关系对人的社会关系的塑造与影响，是资本对人主体化塑造的历史进程，更是人产生诸多现代性弊病异化的根源。人与资本的关系构成了当下现代化阶段人的现实性。

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扬弃在物的依赖阶段的现代性问题，就要正确客观地把握住现实的个人的个人学逻辑起点，将每一个人都置于历史与社会的关系中去考量，从而真正关注每一个人的需求。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就是要关注世界历史阶段里人的需要的生产与再生产，就是要明晰资本逻辑对人的资本关系建构，在资本总体的视野里把握个体的现实性。其实，对现实的个人的逻辑起点把握，本身就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问题导向方法的体现。“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1](P20)}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就是在“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以及“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1](P60)} 的时候，新时代作出的中国方案和回答。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事实上就具有了扬弃资本的现代性弊病，通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意义。解决全球贫富分化加剧、全球分配的不正义、生态环境的恶化等一系列问题就真正成为每一个现实的个人的责任和义务。现代社会每一个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关系在扬弃资本现代性上才能获得彰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才能真正实现。

其次，从我们认同到我们再造的深入，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生成中的个人学逻辑演进。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不仅是世界历史深入发展的历史进程，也是共同体建构的历史进程。共同体建构的历史进程，表现为从个体到共同体、我到我们的人学进路。当今时代的问题不再是“人应当如何生活”的传统命题，而是人们“要不要在一起”以及“如何在一起”的问题，前者回应的是“自我认同”，后者回应的是“我们认同”。人们必须在一起，指的是人们必须将自己与一个共同体的政治社会关联起来，通过共同行动克服分裂与碎片化生存的困境。总之，为了克服资本物化时代的自我生存困境，个人必须回归真实的自我，平衡好个体性和社会性的双重关系，特别是需要重新接续社会性维度，在多元社会中建立一个包容最大共识的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学逻辑不是简单地实现“我们复归”，而是在唯物史观的历史必然性基础上，通过人的交往进行共同体的再造。

这种共同体的再造，事实上是“我们再造”，是类的再造，是文明的再造。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首先就是要揭示出人与人紧密联系的关系，进而在紧密联系的关系基础上通过交往互动，再造这一向度的“我们”，再造这一向度的人“类”和人类文明。“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9]

人与人的交往是一种对象化关系建构的过程。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把握，其实就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总和的状态，反映了要在社会关系的“坐标轴”里去把握人；二是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总和的动态，明晰了人的本质是一个关系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其中，关系的形成与发展，正是在人的交往活动中不断实现的。人们通过各种形式的交往活动，在感性对象化活动中，既实现了人本质内容的外化，又通过外在事物的内化丰富自身本质关系规定。“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一个存在物如果本身不是第三存在物的对象，就没有任何存在物作为自己的对象，就是说，它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的存在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3](P210)}

于是，通过“我们再造”来再造共同体，在交往方式上也表现为两个进路：一是通过人们的交往活动将每一个人的本质关系外化，形成紧密联系的关系；二是将紧密联系的关系通过交往活动不断内化，进一步丰富人的本质规定，从而实现“我们再造”。就前者而言，正是人们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从经济全球化开始，不断增加了政治交往、文化交往、社会交往、生态交往等方式，拓展了人的本质关系外化的领域与范围，生成了更多的紧密联系领域。就后者而言，每一个现实的个人也正是在与共同体抑或是他者的交往互动中，真正出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规定。“劳动

对象化使人由个体性存在转化为关系性存在，而共同体是人的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表征。”^{[10](P5)}

最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人学逻辑上的目标导向。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在我们再造的逻辑演进后，其目标指向便转向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人学逻辑的最终旨归。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其自身的文明意义就在于在私有制还存在的历史阶段中，通过“我们再造”的方式，扬弃虚假共同体的虚伪性，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现代生产方式基础上，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五个方面详细地进行科学落实，从而使全球化能够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历史条件，让第二形态社会能够趋向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诚然，在现代生产方式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还是一个价值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施并不意味着在现代就能达到这一价值目标。但是，作为对物的依赖阶段人的异化等现代性问题的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治理效果是趋向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只有这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生成才能够在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基础上始终与价值性相统一。

所以，只有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过程中，才能既立足于现代性又超越现代性，提炼和总结出当下全人类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把握住“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1](P63)}。全人类共同价值不仅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还是其“方法论基础”^{[11](P85)}。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学逻辑价值目标的直接体现。这种体现蕴含着三重价值超越：一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凝练和提出，依旧还是现代性价值，是当前人类现代文明中不同民族、国家、制度都可以直接对话的价值共识与价值规范，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准则；二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凝练和提出，具有对资本主义现代性价值的超越，从而规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对资本现代性的批判和扬弃；三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凝练和提出，具有指向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指引，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必然性基础上真正关注人的价值规范和价值要求，从而以价值目标、价值规范、价值准则等方式规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生成中的人学逻辑实践

行文至此，我们清楚地发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历史生成过程中还存在一条从现实的个人出发，通过“我们再造”的逻辑演进，趋向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学逻辑。正是这条人学逻辑的存在，才能确保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历史生成中实现科学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那么，这条人学逻辑又是如何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生成中实践的呢？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了世界市场向人类社会的基础转变，彰显了个体的自我回归。当今世界依旧处于马克思所指的时代，是由资本主导的世界历史进程。资本推动的现代化，使得人们对人的依赖的社会形态中解放出来，促进了政治解放进程，但是也造成了人们二重性的悖论。“在政治国家真正形成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3](P30)}人们一方面在政治生活领域享受着形式自由，另一方面却受经济、阶级等因素的结构性压迫，造成一种实质的不自由。而这种二重性悖论也在世界各地的“历史”到“世界历史”的进程中蔓延开来。因此，在资本主导的全球化中，自由、民主、平等都只是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国家享有。这种世界性的不公平、不公正，正是建立在资本的世界市场的基础上。因此，世界越“进步”，世界也就越落后；世界越“发达”，世界也就越贫穷。

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就是推动世界历史的基础从世界市场向人类社会转变，扬弃人的二重性悖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历史进程的‘拨乱反正’，充分昭示了‘人类解放’的价值诉求和发展理念，故其基本立脚点或者说哲学立场必然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

类’。”^{[12](P9)}人类社会的基础，就是将人民作为世界历史的主体，将现实的个人作为世界历史的出发点。人们在经济上的差别不能构成本质关系差别。因此，在个体的自我回归基础上，从个体到共同体、我到我们的“我们再造”就表现为对资本主导的交往关系的扬弃，而开始逐渐转向现实的人的交往形式。资本复归为交往的手段和工具，人的文化交流、利益融合逐渐成为交往的主要形式。

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又是如何从现实的个人出发，通过文化交往形式实现“我们再造”，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呢？这一过程，首先表现为集体记忆的再造。以往资本主导的世界交往，使得人们在世界性的分工、交换中产生了密切的经济关系。人们通过商品的生产、消费感受到“地球村”的共同体在场。在“世界历史”形成的这几百年，“地球家园”的概念深入人心。世界上每一项事物的产生与消失都不再孤立，而是直接和间接地对全球任意相关事物产生影响。包括生物技术在内的每一项科学技术的突破都有可能带来世界性的技术变革；包括植被退化在内的环境问题都将影响到整个世界的生态系统；包括奥运会、世界杯的举办都成为了一项世界性的狂欢节等。

这种交往方式的关联，从以往的经济、金融层面已经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各个方面。正是这种社会存在的深刻变化，形成了意识层面的集体记忆。人们开始形成了一个共同家园的集体记忆。而“集体记忆实现了个体从我到我们的认同跃迁”^{[13](P170)}。这种息息相关、生死与共的家园记忆，成为现代社会每一个人的文化结构，构筑个体最深层次的记忆编码。这也是现如今许多关注未来的电影、小说等艺术作品都不约而同地将世界描绘成一个紧密联系的共同体，或者是世界上每一个个体合力救赎的原因。当“地球家园”的集体记忆形成以后，人们又是通过仪式传播的形式实现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的文化交往。越来越多的国际性事物、风险、成就通过现代传媒技术，飞快地被人们认知。人们通过现代信息技术，以直播、即时讯息、发状态等方式与他人分享和互相评论状态。人们在这一交往形式中，通过信息共享到情感共鸣直至价值融合。这一价值融合就表现为形成了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成为了每一个人的理想目标和“我们再造”的集体记忆，并在每一次的仪式互动传播中不断获得确证。正是这种共同价值的形成，成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最大公约数，成为个体形成共同体、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基石。

此外，人类命运共同体还通过现实的个人的普遍利益交往形式实现“我们再造”，从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资本主导的全球化通过资本的交往扩大，带动了一切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流通，直至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格局。随着经济利益的全面深入，人与人之间形成了普遍利益的交往形式。人们越来越感受到作为终极利益的人类命运的一致性。这一过程，也是人的主体性回归进程。资本不再是目的，人的命运成为了目的。在这一共识下，包括经济、政治、安全、环境等一切涉及每一个个人的利益都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利益基础。

而人的普遍利益交往形式形成的“我们再造”，又深刻地体现出对立统一的辩证法。例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对那些利益不同的反人类者是封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明显不包括恐怖主义者、战争犯、损害人类利益的人等。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又是开放的。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共赢和每一个人的利益交往，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利益会越来越一致，直至形成利益共同体。此外，通过普遍利益交往形式形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共同利益的前提下，整合不同的个体，实现普遍利益的交往。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表现为对每一个个体的尊重，对异质性的包容，是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体现。因此，正是这种普遍利益的交往，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既体现为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利益交往形式，也表现为共担风险、协作治理的利益维护形式。个体也在每一次的普遍利益交往中，逐渐形成了共同命运的共同体，为“我们再造”提供了深厚的利益根基。而也正是这种普遍联系的利益，使得经济发展全球化的同时，也丰富了人的社会关系组成，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历史条件。

四、结 语

总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以来对人类文明建构的重大贡献。这不仅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新情况、新现象，还深刻地表现为对人类文明的主体复归，对人的发展的重视，是一场从现实的个人出发，依赖于人的实践活动，生成于人的需要生产与再生产，展开于人的普遍交往，立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进程。这条人学逻辑不只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暗线，而且是蕴含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逻辑中的人学逻辑“注脚”。因此，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学逻辑把握，是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入发展后，特征充分暴露下的必然选择，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 郝立新,周康林.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6).
-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 郝戈. 从资本逻辑看现代性逻辑的生成与发展[J]. 社会科学辑刊,2010(1).
- [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8] 田鹏颖. 历史唯物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1).
- [9]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 人民日报,2017-10-28(01).
- [10] 李维意,闫淑珊.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源泉——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共同体三元结构论视角[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
- [11] 郇庆治,赵睿夫.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类共同价值基础及其时代拓展[J]. 党政研究,2021(6).
- [12] 刘同舫.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创性贡献[J]. 中国社会科学,2018(7).
- [13] 龙柏林,刘伟兵. 记忆整合:中国传统文化整合的时间路径[J]. 青海社会科学,2018(3).

A “Footnote” to the Human Logic of the Historical Genera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LIU Wei-bing

Abstract: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in essence the proces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that of the sublation of human logic over capital logic in the stage of modern world history.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historically generated from the world historical process initiated by capital, and it is the sublation of the global and civilized modernity ills brought by capital in the stage of dependence on things. The process of historical generation itself also contains the human logic that starts from real individuals. Human beings tend to achiev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by reconstructing ourselves. In the process of historical generation, this human logic is put into practice through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 market foundation into human society, cultural interactions and universal exchanges of interests.

Key words: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humanity's common values; human logic; history generation

(责任编辑 孙 洁)